

方励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敦煌遗书散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方广锬 著



敦煌遗书散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广铝敦煌遗书散论 / 方广铝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2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5688-5

I. ①方… II. ①方… III. ①敦煌学—文献—研究

IV. ①K870.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0362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方广铝敦煌遗书散论

方广铝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125 插页2 字数 305,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688-5

K·1324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委会

主 编：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 委：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

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郑阿财（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涌泉（浙江大学教授）

邓文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高田时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 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 30 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14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馀册,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 2010 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 4 人,毕业博士 54 人,14 人晋升教授,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导师,20 人晋升副教授,33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馀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馀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学 术 自 述

一个偶然的机，我参加了 1983 年在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从 1984 年起，至今将近 30 年，会深陷敦煌学的泥潭而不自拔。坦率地说，近 30 年的摸爬滚打，有时也觉苦海无边，但最终乐在其中，流连忘返。

在我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曾与几位同代人讲过：无论国学与外语，我们都无以前辈学者相比。我们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时间，最关键的十年被荒废了。由于基本底子的薄弱和开拓资料手段的缺乏，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的佼佼者外，很难出现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大家。命中注定我们将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故而，与其去做那些做下去也做不透，说出来又不能说服人的‘学问’，不如扎扎实实地多做些资料性工作，让后来者踏着我们的脊背去攀登高峰。这就是我后来改攻佛教文献学的思想根源。”这也是我致力于敦煌遗书调查、编目，以及这些年努力建构网上“敦煌遗书库”的动力。

虽然主要精力沉浸在原始资料的整理中，但有时见猎心喜，也作一些研究；有时骨鲠在喉，便发几句议论。我庆幸先后遇到黄心川、任继愈、季羨林、周绍良等先生，在他们的引导下，逐渐懂得做学问的门径。那就是：

第一，研究一个课题，首先要收集有关原始资料、研究资料与动态资料。对相关资料，要尽力占有，力争一网打尽。

第二,研究一个课题,要先做好这个课题的研究史,并随时观察、跟踪学术的最前沿。

第三,对任何人都不迷信,对任何问题都没有预设前提。要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研究对象。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体会是三点:一是努力把握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二是努力把握“物质在时空中运动”这一规律;三是努力把握“一切事物都在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状态中存在”这一规律。

第四,所谓“大处着眼”,是指观察事物要观其大略,把握事物要把握大局。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具体对象、处理具体材料时不迷失方向。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带着大局观去审察小材料。有了相应的知识积累,再用大局观去细致地观察与思考小材料,不少小材料会显示大价值。还有,小处着手时,要特别注意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第五,尊重材料的原始面貌,一切以材料为依据。有几分依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做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第六,沉潜笃实,“为学须入地狱”。

第七,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其实,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尽善尽美之境。提这样的要求,无非是以“取法于上,得之于中;取法于中,得之于下”的古训来警惕自己。以尽量少犯错误,特别是力争不犯大错误。

第八,尽全力做好那些自己能够把握的事情。做过的工作,争取不要让别人再做第二遍。但对那些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则连梦都不去做。

上面这些话有些是学术界的老生常谈,有些是先生们的谆谆教导,有些是自己的体会。古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当年先生们把金针交给我们,希望我们能运针飞线,绣出凤凰,恩德难酬。

当然,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真正把那些教导贯穿起来,融化到自己的血液里,变成自觉的行为准则,的确需要经过一番磨练。

希望上述感受,对年青的朋友们能够有所启发。

我主要研究佛教。原本以佛教历史与思想为主,后来侧重于佛教文献学,从佛教文献学进入敦煌学,但侧重点依然在佛教。由于主要精力用于敦煌遗书整理,所以虽在上述领域做了一点研究,取得一点成果,但很有限。就敦煌遗书整理而言,这样的工作,我不来做,迟早也会有人来做。只不过我的因缘条件好一点,也就是遇到的好人多一点,得到的帮助大一点,于是做的工作就多一点。由敦煌遗书整理,不可避免地涉及敦煌遗书鉴定。文物鉴定不神秘,无非靠多接触、多比较、多思考、多总结。我现在对敦煌遗书鉴定有底气,主要因为见得多,有条件去比较、思考、总结。其他人如果有同样的因缘条件,也许比我做得更好。

我最主要的学术创新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提出要重视对中国佛教中信仰层面佛教的研究;第二是提出要重视对佛教发展中“文化汇流”现象的研究。这两个学术创新点的产生,都得益于敦煌遗书。上述两点,第一点指出当今中国佛教研究的缺憾,如果解决,可以推动中国佛教研究大步前进;第二点则关涉整个佛教研究的全局,如果重视,将打开佛教研究的新局面。遗憾的是,我仅仅是“提出”而已,虽然做了一点研究,也仅限于论证这两个创新点“立项”的合理性。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将努力在有生之年将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做完,也算对老师、对诸多帮助过我的人有所交代。如果有可能把想写的题目写出若干,可算上天的额外眷顾。“敦煌遗书库”目前虽然已经拉起架子,但“功成必不在我”,它的最终完成,还要靠青年一代的不懈努力。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创新点,只能作为学术遗产交下去。但最终是否能够交得下去,我连梦都不去做。

归根结底,人在社会中生活,一切活动离不开他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在这篇学术自述的结尾,我要感谢一切曾经给我顺缘,亦即帮助过我的人;也要感谢一切给我逆缘,亦即阻碍过我的人。无论顺缘还是逆缘,都是增上缘,使我的学术经历丰富多彩。

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于通州皇木厂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学术自述	1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	1
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	
——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	28
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	
——兼为王冀青先生补白	51
敦煌经帙	58
关于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与编目	77
漫谈敦煌遗书	98
斯坦因敦煌特藏所附数码著录考	108
初创期的敦煌学	
——以收藏题跋为中心	117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言	138
谈粘叶装	
——中国书籍装帧史札记之一	154

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

——新材料与新问题	184
略谈敦煌遗书的二次加工及句读	219
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	234
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	266
关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若干资料	286
敦煌本《坛经》录校三题	309
中国敦煌遗书与日本奈良平安写经	330
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1909~1954)	348
关于“敦煌遗书库”的构想	369
附录:论著目录(1981~2010)	393
作者简历	406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①

一

由于敦煌莫高窟第 17 窟藏经洞封闭的原因直接关系着对洞内文物的认识,是敦煌研究中的大问题,因而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思考。

最早论及这一问题的当推伯希和。他在 1908 年所撰《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

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公历 976 年至 983 年)及至道(公历 995 年至 997 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 1035 年西夏侵占西陲时也。洞中藏弃,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缂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②

这里,伯希和主张藏经洞乃因畏西夏侵掠而被封闭,此可称为“避难说”。其后,伯希和在华演说时,又绘声绘色地进一步申说这一观点:

(藏经洞之被封闭),当是 1035 年,藏人(当为“西夏人”之误——方按)侵掠敦煌时,寺僧闻警,仓卒窖藏书画,寇至僧歼,后遂无知窖处者。^③

从上述引文可知,伯希和因洞中卷本之年款为至道以前及无西夏文而主张藏经洞应当封闭于 11 世纪前半期,避难说则是他用以支持其藏经洞封闭年代说的一条依据。而用以支持避难说的根据则是:“洞中藏弃,至为凌乱……(各种物品)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略而仓皇出此。”我们知道,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于 1900 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而伯希和于 1908 年 3 月 3 日才进入洞中,距藏经洞之被发现已近八年。在此期间,敦煌遗书已开始流散,斯坦因也已将大量石室文物运走。也就是说,在伯希和之前,不知已有多少人、多少次曾进入藏经洞。据情理推测,起码在藏经洞发现之初,王道士就曾把洞内藏品全部翻腾过一遍,看看洞里到底藏了些什么。伯希和自己也了解这一情况,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④可见,伯希和所见的藏经洞内物品“杂沓堆置”之状并非启封时的初貌。因此,据此推出的“避难说”是难以成立的。联系到藏经洞被人用土坯封闭后,外壁被抹上墙泥,涂以白垩,饰以壁画,可见它的封闭绝不是一种“仓皇”的举动,伯希和此说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虽则如此,伯希和的避难说仍然为多数中外学者所接受。如斯坦因说:“就卷尾以及文书中间所记载的正确年代……再加上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校,可知这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 11 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⑤罗振玉说:“一洞藏书满中,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加像饰,故不能知其为藏书之所。”^⑥姜亮夫说:“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乱